

# 劉知幾之《春秋》《左傳》學——兼論 詩化之史學觀

張高評\*

〔摘要〕

唐初劉知幾私撰《史通》，多譏往哲，喜述前非，不僅破棄墨守，且又挑戰典範。本文就史家之經學觀、詩化之史學觀二方面，評價劉氏之《左傳》學，得出下列結論：一、《左傳》以史傳經，學者苟欲觀「善惡必彰，真偽盡露」之實錄，當求之《左傳》；若尋之《春秋》，則「實乖此義」。二、《左傳》為「敘事之最」，「信聖人之羽翮，而述者之冠冕」；劉氏往往據以權衡《春秋》與二傳之是非得失，所謂「《左氏》之義有三長，而《二傳》之義有五短」者是。三、劉氏極重視歷史文學，揭櫫「尚簡」、「用晦」諸歷史語言，要皆詩歌語言之圭臬；而存真、實錄，則又介乎詩史之際。四、為振救史學之流弊，《史通》標榜敘事之簡要，所謂華逝實存，文約事豐云云，《左傳》敘事多有具體而微之體現。五、又揭櫫用晦之道，大抵關涉史料之取捨別裁，語言之經營安排，可以凸顯詩學特徵，可以強化美感效應，蓋合形象美、含蓄美、簡潔美而一之。六、劉氏受唐初史學影響，主張實錄直書，期許歷史敘事如明鏡照人，虛空傳響，真實呈現，無所遁隱。推崇《左傳》「言事相兼，煩省合理」，其童謠俗諺、城謳輿誦，固溫潤素美，非經琢磨筆削；其外交詞命，行人應答，更微婉多切，流靡而不淫，是樸拙典雅，並傳其真。至於敘事傳人，擬言代言，亦多歸於史學存真之要求。

關鍵詞：《史通》、《春秋》、《左傳》、以史傳經、尚簡、用晦、存真

---

\* 國立成功大學特聘教授，中文系教授

收稿日期：2008年1月2日，審查通過日期：2008年2月13日

責任編輯：劉昭明教授

## 一、從墨守《正義》，到非聖毀經

經學之發展，由漢儒之訓詁章句之學，發展為南北朝隋唐「義疏之學」，自有其過程與脈絡。因應大唐帝國之盛世，唐太宗政治統一之餘，又致力推展學術文化之統一，自是勢所必至，理有固然。經學既為儒學之大本營，遂成為統一之大指標。

初，唐太宗詔顏師古（581-645）考定《五經》，於貞觀七年（633）頒布天下，為統一經典與經學奠定基礎。其後，唐太宗「又以儒學多門，章句繁雜，詔國子祭酒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義疏》」（《舊唐書·儒學列傳》）。孔穎達（574-648）領銜纂修之《五經義疏》（其後更名為《五經正義》），始撰於貞觀十二年（638），從受詔、主撰，到複審、刊定，於高宗永徽四年（653）完成。高宗下詔「頒於天下，每年明經，依此考試」。<sup>1</sup>《五經正義》之著述旨趣，係針對南北朝以來義疏之學作規範與統一。皮錫瑞（1850-1908）《經學歷史》稱：《五經正義》頒行後，「自唐至宋，明經取士，皆遵此本」；「以經學論，未有統一若此之大且久者」，不僅經、傳文本統一，更主要在義疏本之統一，論者遂以「統一時代」指稱此一時期之經學。<sup>2</sup>

《五經正義》頒布之後五十餘年，劉知幾《史通》問世，師法王充（27-97）《論衡》〈問孔〉、〈刺孟〉，而撰著〈疑古〉、〈惑經〉諸篇，非毀孔聖，挑戰經學一統之權威。〈惑經〉所謂：「昔王充設論，有〈問孔〉之篇，雖《論語》群言，多見指摘，而《春秋》雜義，曾未發明。是用廣彼舊疑，增其新覺，將來學者，幸為詳之」，劉氏疑經疑聖之作風，為中唐啖助（724-770）、趙匡（?-770-?）、陸淳（?-773-784-?）新《春秋》學派之先驅。《史通·自序》稱其書：「多譏往哲，喜述前非」，批判經書，質疑孔聖之作風，堪稱宋學議論精神、懷疑精神、創造精神、開拓精神之開山。<sup>3</sup>

<sup>1</sup> 《唐會要》卷七十七，王溥編，〈論經義〉，台北：世界書局，1961年。

<sup>2</sup> 《經學歷史》，清·皮錫瑞撰，七、〈經學統一時代〉，「自《正義》、《定本》頒之國胄，用以取士，天下奉為圭臬。唐至宋初數百年，士子皆謹守官書，莫敢異議矣。故論經學，為統一最久時代。」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7月，頁139、頁146；參考《中國經學思想史》，姜廣輝主編，第四十四章〈政治的統一與經學的統一——孔穎達與《五經正義》〉，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9月，頁724-743。

<sup>3</sup> 〈中唐新儒學運動的一種考察——劉知幾的經書批判和啖、趙、陸氏的《春秋》學〉，稻

劉知幾《史通》之研究，學界成果豐碩，大多推崇其史學諸成就。<sup>4</sup>今嘗試從學科整合觀點，探討劉知幾之《左傳》學，分為史家之經學觀、詩化之史學觀，以考察《左傳》之《春秋》學價值，以及劉知幾論敘事藝術與歷史語言之書寫，分論如下：

## 二、《左傳》之《春秋》學價值——史家之《春秋》學觀

劉知幾(661-721)一生，學史治史凡五十年，已佔人生六分之五；「三為史臣，再入東觀」，而掌知國史，前後近三十年。《舊唐書》卷一百二〈劉子玄傳〉稱其「自幼及長，述作不倦，朝有論著，必居其職，預修《三教珠英》、《文館詞林》、《氏族系錄》、〈論孝經非鄭玄注〉、《老子河上公注》、修《唐書實錄》，皆行於代，有集三十卷。」

劉知幾撰著《史通》，內篇三十九篇（其中三篇亡佚），外篇十三篇，凡五十二篇，尤稱史學界不朽之盛事。不僅理論性總結唐以前史學成果，同時對史學發展進行批判、糾謬，與變革。舉凡史學之基本精神，史書之編纂體例，書法之強調，史文之要求，史料之采擇，史家之素養，乃至於史學發展之未來趨勢，《史通》多有論述，堪稱先唐史學批評之理論總結，以及劉勰《文心雕龍·史傳》之開拓與發揚，所謂「史學之總結，歷史之總結」，《史通》一書真足當之。<sup>5</sup>

劉知幾既以史學名家，加以貫通經史，故凸出「六家」，作為中國史學之源流。所謂「六家」，指《尚書》家、《春秋》家、《左傳》家、《國語》家、《史記》家、

葉一郎撰、李魁平譯；〈由陸淳至北宋《春秋》學——唐宋新《春秋》學之系統〉，齋木哲郎撰，金培懿譯，《啖助新春秋學派研究論集》，張穩蘋編，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2年9月，頁305-338；頁555-586。所謂「宋學精神」云云，《北宋文化史述論》，陳植鏗撰，第三章第四節，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3月，頁287-308。

<sup>4</sup> 〈台灣地區《史通》研究之回顧(1949-1994)〉，李紀祥撰，《國立編譯館館刊》25卷1期(1996年6月)；〈《史通》研究五十年(1949-1998)〉，戴繼華撰，《中國史研究動態》2000年1期。

<sup>5</sup> 有關劉知幾史學成就之論述極夥，可參《中國史學家評傳》，陳清泉等編，蘇淵雷〈劉知幾〉評傳，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3月，頁409-419；《中國史學思想史》，吳懷祺撰，第三編第七章第二節《文心雕龍·史傳》、《隋書·經籍志》和《史通》對史學的總結》，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12月，頁181-195。

《漢書》家。其中前三者為經學，即孔穎達《五經正義》所訴求經學統一之典籍，劉知幾降經為史，特提《尚書》、《春秋》、《左傳》三家，以揭示史學淵源，以展現發展流變，頗有挑戰典範，自我作故之創新精神。劉知幾深體經史同源之事實，發揮考鏡淵流史家之本色，《史通》於開宗明義〈六家〉篇稱：「古往今來，質文遞變，諸史之作，不恆厥體」，因此而有「六家」之流別。經學典籍所以成為傳統史學淵流之一家，《尚書》主要在「疏通知遠」，《春秋》主要在「屬辭比事」，前者表明史學述作之根本要旨，後者強調史書編纂之基本精神。劉知幾以史學源流眼光看待《尚書》《春秋》，故經書遂體現史學色彩。推此而言，劉知幾持史家視角觀察《左傳》，《左傳》遂無往而不史乘，亦無往而不史學。

劉知幾既以史學視角觀看經籍，故《春秋》與《左傳》，依史籍體例，各自獨立成家，然又同列為傳統史學之濫觴。筆者以為，唐代史學家之經學觀，於劉知幾《史通》之論《春秋》、《左傳》，堪稱代表。就《史通》評述《左傳》而言，劉知幾發明《左傳》學，有兩大方面之重點：其一，《左傳》以歷史敘事詮釋《春秋》經；其二，《春秋》《公羊》《穀梁》之是非得失，可據《左傳》敘事為權衡。試分別論證如下：

### （一）《左傳》「以史傳經」之貢獻

傳之為書，本為釋經而作。《左傳》、《公羊傳》、《穀梁傳》詮釋孔子《春秋》經，其方式殊異：《公羊》、《穀梁》「以義傳經」，頗多別解；唯《左傳》「以史傳經」，最得聖經之真諦。劉知幾《史通》於此，多所強調，如云：

孔子既著《春秋》，而丘明受經作傳。……觀《左傳》之釋經也，言見經文而事詳傳內，或傳無而經有，或經闕而傳存。其言簡而要，其事詳而博，信聖人之羽翮，而述者之冠冕也。（《史通通釋》卷一，〈六家〉）

三傳解經，各有策略，《左傳》「以史傳經」，以歷史敘事方式解釋孔子《春秋》經；《公羊傳》、《穀梁傳》「以義解經」，以歷史哲學方式解讀孔聖《春秋》經。劉知幾《史通·六家》謂「《左傳》之釋經也，言見經文，而事詳傳內」，無異「讓歷史自己講話」，「還原歷史本來面目」，徐復觀稱為「以史傳經」。兩者相較，《公羊》、《穀梁》「以義解經」，是「代歷史講話，或者說是孔子代歷史講話」；而《左傳》「以史傳經」，「則是讓歷史自己講話，並把孔子在歷史中所抽出的經驗教訓，還

原到具體的歷史中，讓人知道孔子所講的根據」。《公羊》、《穀梁》論說，由理念演繹推斷產生；《左傳》敘事，則具體表述歷史事實。由此觀之，《左傳》以史傳經之方法，其意義實遠在傳經之上。<sup>6</sup>劉知幾評價《左傳》解經之貢獻，稱「信聖人之羽翮，而述者之冠冕」，可見，《左傳》所以為史之一家，主要在善「述」，其基本精神在此。

桓譚（23BC-50AD）《新論·正經》云：「《左氏傳》於經，猶衣之表裏，相待而成。經而無傳，使聖人閉門思之十年，不能通也！」<sup>7</sup>《左傳》以史傳經，具體呈現人物與事件，還原歷史本來面目，讓歷史自己說話；如此，以敘事為議論，以敘事為抒情，可以替代解釋，省略說明，而解釋說明未嘗不在其中。從歷史視角出發，以考察《左傳》與《春秋》之依存關係，劉知幾《史通》〈申左〉多所發明，如云：

至於實錄，付之丘明，用使善惡必彰，真偽盡露；向使孔經獨用，《左傳》不作，則當代行事，安得而詳者哉？蓋語曰：「仲尼修《春秋》，逆臣賊子懼。」又曰：「《春秋》之義也，欲蓋而彰，求名而亡，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尋《春秋》所書，實乖此義，而《左傳》所錄，無愧斯言；此則傳之與經，其猶一體，廢一不可，相須而成。如謂不然，則何者稱為勸戒者哉？（《史通通釋》卷十四，〈申左〉）

《史通·申左》，自正反二方面，申說《左傳》與《春秋》之密切關係：先從反面立論：「向使孔《經》獨用，《左傳》不作，則當代行事，安得而詳者哉？」後從正面申說：「傳之與經，其猶一體，廢一不可，相須而成」。《左傳》與《春秋》經之關係，一言以蔽之，即「事與義之辯證」。《孟子·離婁下》稱孔子作《春秋》：「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左傳》偏重史事與史文之融合與揮灑，《春秋》留存許多曖而不明、鬱而不發之「義」，《春

<sup>6</sup> 《兩漢思想史》，徐復觀撰，〈原史〉，十、左氏「以史傳經」的重大意義與成就，臺北：學生書局，1979年9月，頁270-275。

<sup>7</sup> 《史通箋記》，程千帆撰，〈申左第五〉引《新論·正經》，文字如此，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程千帆選集》（上），莫礪鋒編，瀋陽：遼寧古籍出版社，1996年6月，頁291。《太平御覽》卷六一〇，宋·李昉編，〈學部四·春秋〉，文字稍異，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2月，頁2746。

秋》之「義」，必待《左傳》之「事」，否則難以發明。董仲舒（179-104BC）《春秋繁露·俞序》引孔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司馬遷（約 145-87BC）作《史記》，敘記楚漢之爭以還，唯恐觸忌犯諱，往往「寓論斷於序事之中」，<sup>8</sup>其知道乎！《漢書·藝文志》稱左丘明「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杜預（222-284）《春秋經傳集解·序》，亦闡述經傳相互發明之關係，所謂「《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史事與經義相互闡發，相須而成，不能偏廢，向來為討論《春秋》學無可爭議之進路與要領。其後，啖助稱《左傳》：博采諸家，敘事尤備，能令百代之下頗見本末。因以求義，經文可知；陳傅良（1137-1203）謂《左氏》：「本依經為傳，縱橫上下，旁行溢出，皆所以解駁經義，非自為書」；黃澤（1260-1346）尤其標榜《左傳》表述歷史事實之功效：「事實而理訛，後之人猶有所依據，以求經旨，是經本無所損也；事訛而義理閒有可觀，則雖得大公正至，於經實少所益，況未必大公至正乎？」進而宣稱：「使非《左氏》事實尚存，則《春秋》益不可曉矣！」<sup>9</sup>其後，《四庫全書總目》稱：「漢晉以來，藉《左氏》以知經義；宋元以後，更藉《左氏》以杜臆說」，此無他，《左傳》「歷史敘事」之效應有以致之。要之，諸說之言經傳關係，多有異曲同工之妙。<sup>10</sup>

總之，諸家討論《春秋》與《左傳》之經傳關係，大抵不離《孟子》所謂「其義」與「其事」之辯證。蓋《左傳》之於《春秋》，猶華嚴宗說「理事圓融境」，理融於事，事融於理，事理二而不二，不二而二，是為無礙；<sup>11</sup>《左傳》以歷史敘

<sup>8</sup> 《日知錄》，清·顧炎武撰，清·黃汝成《集釋》本卷二十六，〈史記於序事中寓論斷〉，樂保群、呂宗力校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2月，頁1429；參考《中國史學史論集》，白壽彝編，〈司馬遷寓論斷于序事〉，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4月，頁80-97。

<sup>9</sup> 《經義考》卷一百六十九，清·朱彝尊編著，〈春秋二〉，林慶彰等點校補正本，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2000年，頁514、518、521、525、526。參考《春秋書法與左傳學史》，張高評撰，〈黃澤論《春秋》書法——《春秋師說》初探〉，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2年1月，頁166-175；《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十六，永瑤編，〈經部二十六·春秋類一〉，臺北：藝文印書館，1969年；《春秋左傳正義》六十卷，臺北：藝文印書館，1974年10月，頁536。

<sup>10</sup> 《四庫全書總目》，紀昀等編，卷二十六〈《春秋左傳正義》提要〉，臺北：藝文印書館，1974年10月，頁537。

<sup>11</sup> 《禪宗思想淵源》，吳言生撰，第七章，五、〈禪宗的理事圓融境〉，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6月，頁259-272。

事，解釋孔聖《春秋》經之「義」，其語境似之，可以相互發明。

## （二）《左傳》乃《春秋》與二傳是非得失之權衡

《春秋》二傳，各有優劣得失，歷代學者論述極多，而獨推揚《左傳》。<sup>12</sup>《史通·鑒識》稱：「《春秋左氏》，三傳之雄霸」；〈模擬〉篇更稱美「《左氏》為書，敘事之最」。蓋劉知幾《史通》，立足史家視角，重視史料佐證，以考察《春秋》及《公羊》《穀梁》《左傳》三傳，故軒輊如此。記事，為古春秋之成法；考察甲骨文、鐘鼎文，記事之方式，皆與孔子《春秋》相近或相同。<sup>13</sup>記事發展為敘事藝術，亦未失其《春秋》之體式。劉知幾之論述，可謂不離其宗。《史通》十分推崇《左傳》之敘事藝術，於〈六家〉、〈載言〉、〈載文〉、〈言語〉、〈浮詞〉、〈敘事〉、〈直書〉、〈鑒識〉、〈模擬〉、〈覈才〉、〈申左〉、〈點煩〉、〈雜說〉諸篇，曾作多層面之論述。劉知幾蓋以史家觀點，看待《左傳》之敘事，此自《史通》〈惑經〉篇，以文獻之無徵，史料之有闕，質疑《春秋》之義，「其所未諭者有十二」，「其虛美者有五焉」，可以知之。其中云：

趙孟以無辭伐國，貶號為人；杞伯以夷禮來朝，降爵稱子。虞班晉上，惡貪賄而先書；楚長晉盟，譏無信而後列。此則人倫臧否，在我筆端，直道而行，夫何所讓？奚為齊、鄭及楚？國有弑君，各以疾赴，遂皆書卒？夫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凡在含識，皆知恥懼；苟欺而可免。則誰不願然？且官為正卿，返不討賊，地居冢嫡，藥不親嘗；遂皆被以惡名，播諸來葉。必以彼三逆，方茲二弑，躬為梟獍；則漏網遺名，跡涉瓜李，乃凝脂顯錄；嫉惡之情，豈其若是？其所未諭一也。（《史通通釋》卷十四，〈惑經〉）

〈惑經〉所列《春秋》未諭者，蓋參閱《左傳》敘事而為言，此孔子所謂「徒託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者。清蒲起龍（1730年進士）《史通通釋》云：「經何以惑？為傳惑也。為傳惑，曷為言惑經？傳主事，經主義。」《四庫全書總

<sup>12</sup> 《左傳導讀》，張高評撰，第二章第一節〈三傳得失議〉，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年8月，頁13-23。

<sup>13</sup> 《劉申叔先生遺書》（三），《左龔集》卷二，劉師培撰，〈古春秋記事成法攷〉，台北：華世出版社，1975年4月，頁1445。《中國史學史稿》，劉節撰，三、〈古代史籍的雛形及其蛻變〉，台北：弘文館出版社，1986年6月，頁17-22。

目·春類一》稱：「刪除事跡，何由知其是非？無案而斷，是《春秋》為射覆矣。」<sup>14</sup>世人解經若不參案《左傳》之敘事，將如同射覆猜謎。桓譚所謂「經而無傳，使聖人閉門思之十年，不能通也！」劉知幾言「惑經」，蓋指此。〈惑經〉所列未諭者，試考察《左傳》敘事，即可渙然冰釋，如杞伯稱子，載《左傳》僖公二十七年；貪賄先書，見僖公二年；楚長晉盟，詳襄公二十七年；趙盾反不討賊，見宣公二年；許世子弑君，見昭公十九年，《左傳》皆事具本末，因文可知。然獨求《春秋》一書，則彼此或義理扞格，或體例不倫，或史法乖違，或褒貶無準，或繁省失當，或真偽莫分，大抵先存一《公》《穀》義例於胸中，遂生此惑。故劉知幾所惑者，不必然即是孔子據魯史以修《春秋》時「竊取之義」，謂之據《左傳》以批判《公羊》《穀梁》之微言義例，則庶幾可解。<sup>15</sup>劉知幾之〈惑經〉，諸家多不以為然，皮錫瑞〈史通惑經篇書後〉甚至言：「子元本是史才，未通經術，欲以據事直書之例，妄繩受命制作之書，何異北轍南轅，方柄圓鑿？」<sup>16</sup>無論據事直書，或史料編纂取舍，皆與《左傳》最有關聯。故《史通·惑經》又云：

蓋君子以博聞多識為工，良史以實錄直書為貴；而春秋記它國之事，必憑來者之辭，而來者所言，多非其實。或兵敗而不以敗告，君弑而不以弑稱；或宜以名而不以名，或應以氏而不以氏；或春崩而以夏聞，或秋葬而以冬赴；皆承其所說而書，遂使真偽莫分，是非相亂。其所未諭十二也。（《史通通釋》卷十四，〈惑經〉）

又案趙穿殺君，而稱宣子之弑；江乙亡布，而稱令尹所盜。此則春秋之世，有識之士莫不微婉其辭，隱晦其說。斯蓋當時之恒事，習俗所常行。而班固云：「仲尼歿，而微言絕。」觀微言之作，豈獨宣父者邪？其虛美五也。（《史通通釋》卷十四，〈惑經〉）

劉知幾身為史家，故〈惑經〉篇持「博聞多識為工，實錄直書為貴」，期勉君子與良史，並以之質疑《春秋》史料文獻之偏窄失實，以致發生「以先為後，以後為

<sup>14</sup> 同註 10，頁 536。

<sup>15</sup> 《春秋左傳學史稿》，沈玉成、劉寧撰，第七章第三節，《史通》中的〈惑經〉〈申左〉，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6月，頁 184-186。

<sup>16</sup> 《程千帆選集》（上），莫礪鋒編，第一種《史通箋記》，附錄一，引《師伏堂駢文》後編卷二，瀋陽：遼寧古籍出版社，1996年6月，頁 282。

先，日月顛倒，上下翻覆」之誤，及「真偽莫分，是非相亂」之失。考《史通·史官建置》曾言：「書事記言，出自當時之簡；勒成刪定，歸於後來之筆」；又謂：「當時草創者，資乎博聞實錄，若董狐、南史是也；後來經始者，貴乎偽識通才，若班固、陳壽是也」，「當時簡」與「後來筆」相需相求，融鑄為一，方成良史。<sup>17</sup>蓋「褒貶之例，二傳最明；臧否之文，《左氏》間具」，必也三傳會通以釋經，方能免除「真偽莫分，是非相亂」之迷惑。<sup>18</sup>至於〈惑經〉論述「虛美」之五，所指「趙盾弑其君」書法，謂「微婉其辭，隱晦其說」，皮錫瑞駁之曰：「反不討賊，藥不親嘗，乃以明臣子之重防，創非常之異義。」何況，晉趙盾書弑，本由董狐；許世子藥弑，欲蓋而彌彰；由此可見，「善惡直書，史官之實錄；賢者為諱，《春秋》之微辭。」<sup>19</sup>劉知幾史學標榜「書法不隱」之「直筆」，故致力表現「實錄」之精神；不過，為存名教，史家載筆，可以為君父隱諱。<sup>20</sup>此一據事直書與微婉顯晦之相濟為用，亦《左傳》所載《春秋》五例之流亞。

劉知幾幼好《春秋左氏傳》，諷讀不怠。及著《史通》，乃於《春秋》之外，別立《左傳》一家，肯定《左傳》「不遵古法」，稱美《左傳》「言事相兼，煩省合理，故使讀者尋繹不倦，覽諷忘疲」(〈載言〉)，以為後世史乘標名為紀、略、春秋者，「大抵皆以《左傳》為準的焉」。劉氏對《左傳》推崇備至，評價之高超越《春秋》一書。《史通》有〈申左〉篇，較論《春秋》三傳得失，有所謂「《左氏》之義有三長，而《二傳》之義有五短」者，足見其軒輊，如云：

《春秋》之作，始自姬旦，成於仲尼；丘明之傳，所有筆削及發凡例，皆得周典；傳孔子教，故能成不刊之書，著將來之法。其長一也。(《史通通釋》卷十四，〈申左〉)

《春秋》，為孔子據魯史、寓褒貶之一部歷史哲學，所重在義；《公》《穀》「以義

<sup>17</sup> 〈試論劉知幾與章學誠對《春秋》理解的異同〉，李紀祥撰，《簡牘學報》第十五期，1993年12月。

<sup>18</sup> 同註16，附錄二，引但燾《法通解惑》篇，就劉氏〈惑經〉所提示未論者十二，逐一釋疑解惑。其十二，「解之曰」，見頁289-290。

<sup>19</sup> 同註16，頁282-283。

<sup>20</sup> 〈義例、名教與實錄——劉知幾史學思想溯義〉，閻鴻中撰，《臺大歷史學報》第31期，2003年6月。

傳經」，於《春秋》為近。《左傳》以史傳經，「博采諸家，敘事尤備，能令百代之下頗見本末。因以求義，經文可知」，誠所謂隨事解經，炳若日星。漢儒治《左傳》，如賈逵、服虔等，多雜引《公》《穀》義例，至杜預始專引《左傳》以釋經。自唐初孔穎達主纂《五經正義》，《春秋》經用《左氏傳》，《左傳》則專用杜預《集解》。《五經正義》既頒布天下，影響士林，故劉知幾討論《春秋》學，遂取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序》一家之言為說。《史通·自敘》言：劉氏十二歲時，其父於《左氏傳》已為之「講誦都畢」，知幾諷讀不怠之餘，已能「略學大義」；《史通》於《左氏》杜義，愛賞之，推重之，職此之故。〈申左〉稱「邱明作傳，傳孔子教」，此官方定本《五經正義》中杜義之論調，而劉氏列為「《左氏》之義有三長」之第一長，高屋建瓴，先立其大，其尊崇《左傳》有如此者。

「《左氏》之義有三長」，其他二長，一為敘事詳贍，一為史料廣博，兩者相互為用，而優秀美妙之歷史散文生焉：

丘明既躬為太史，博總羣書；至如《禘祫》、《紀年》之流，《鄭書》、《晉志》之類，凡此諸籍，莫不畢觀。其傳廣包它國，每事皆詳，其長二也。（《史通通釋》卷十四，〈申左〉）

《論語》子曰：「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夫以同聖之才，而膺授經之托，加以達者七十，弟子三千，遠自四方，同在一國；於是上詢夫子，下訪其徒，凡所採摭，實廣聞見。（《史通通釋》卷十四，〈申左〉）

必執二傳之文，為取依經為主。……儒者苟譏左氏作傳，多敘經外別事，如楚、鄭與齊三國之賊，隱、桓、昭、襄，四君之篡逐。其外，則承告如彼，其內，則隱諱如此，若無左氏立傳，其事無由獲知。然設使世人習《春秋》，而唯取兩傳也，則當其時二百四十年行事，茫然闕如；俾後來學者兀成聾瞽者矣。（《史通通釋》卷十四，〈申左〉）

左丘明身為魯國史官，曾與孔子同乘觀書於周太史氏，因此，《左傳》參考百二國寶書，以敘寫列國事跡，自多「經外別事」，《公羊》學家所謂「無經之傳」，所謂經闕傳存、傳有經無，且持此以疑「左氏不傳《春秋》」之證。或者丘明曾見國史，故傳得有舍經而別載行事之文，或者為經之遺文，或者為經義之旁證，或者因割

傳附年所致，章太炎、劉師培等已申明其說，<sup>21</sup>足見《左傳》於文獻徵存發明之功。《左傳》長於敘事藝術，<sup>22</sup>《史通》於〈六家〉、〈載言〉、〈載文〉、〈言語〉、〈浮詞〉、〈敘事〉、〈直書〉、〈鑒識〉、〈模擬〉、〈覈才〉、〈申左〉、〈點煩〉、〈雜說〉諸篇，對於《左傳》敘事之層面及方法，多有論證。後世治《春秋》、《左傳》者，於此亦多所闡發；略謂：左丘明為魯史官，躬與國史之修，於是纂集百二國寶書而作傳，非特列國聘享、會盟、修好、專對之詞，在所必錄，即戰陣、禦侮、取威、定霸之謀，足為經世資鑑者，亦兼收並錄；甚至諸侯家傳、占卜書、縱橫家、小說、諷諫之文，亦載存其中。啖助《春秋集傳纂例·三傳得失議》稱《左傳》：「博采諸家，敘事尤備，能令百代之下頗見本末。因以求義，經文可知」；《經義考》卷一百六十九引羅欽順曰：「《春秋》事迹莫詳於《左傳》。《左傳》於聖人筆削意義，雖無甚發明；然後之學《春秋》者，得其事跡為據，而聖經意義所在因可測識」；總之，《左傳》發明《春秋》之功，啖助「因以求義，經文可知」一語足以概括之。《史通·申左》所提二長、三長云云，敘事翔實，採摭廣博，諸家同聲稱譽。《左傳》運化此二者，以發明孔子《春秋》，或以書法義例，或以據事直書，或以屬辭比事，或以勸善懲惡，或以之表裡《論語》，或以之歸本於禮，<sup>23</sup>《四庫全書總目·春秋類一》所謂「刪除事跡，何由知其是非？無案而斷，是《春秋》為射覆矣」，一語道破《左傳》「以史傳經」之不二貢獻。現當代學者張舜徽於此亦頗有發揮，其言曰：

要之，《左氏》之可貴，在能備《春秋》之本事。凡所記載，雖不必事事皆實。而在後世欲考《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遺事者，必徵之於是書。故論其功用，非特與《二傳》不同，即與《春秋》亦復異體。蓋《左氏》為史，《春秋》為經。《春秋》之義，不存於《左氏》。《左氏》之事，足以考《春秋》。自可相輔而行，不必強合為一也。（張舜徽《史學三書評議》，《史通評議》卷六）

「《左氏》為史，《春秋》為經；《春秋》之義不存於《左氏》，《左氏》之事足以考

<sup>21</sup> 參考同註 12，第五章〈論左傳之解經與緣飾增續〉，四、經有傳無，頁 109-110。

<sup>22</sup> 《與西方史家論中國史學》，杜維運撰，第三章第五節〈中國史家長於敘事藝術〉，引劉知幾《史通》為論證，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1年8月，頁 90-93。

<sup>23</sup> 同註 12，第五章第三節〈論左氏解傳《春秋》經〉，頁 120-134。

《春秋》，故自蘇轍《春秋集解》、<sup>24</sup>趙汭《春秋師說》，多以為治《春秋》，當事據《左傳》，義主《公》《穀》。蓋「事之不可意推者，當從史」；「《春秋》者，有待於史而後足」；《左傳》，史也，《春秋》所載二百四十二年事之本末原委，不考諸《左傳》歷史，其事既難知，又將如何以意推測？《史通·申左》所謂《左傳》三長，大抵從史料史學視角立說，除今文學家公羊學派之外，歷代學者大多未有異議。<sup>25</sup>

《史通》一書，稱賞《左傳》，批評《公》《穀》，〈鑒識〉篇曾加軒輊；同時〈申左〉亦推崇《左傳》，貶抑《公羊》《穀梁》，其立說多採三傳較論方式，而且抑二傳，揚《左氏》，優劣得失相形，所謂「方之《左氏》，不可同年」云云，以凸顯《左傳》之優長。如下列論述傳聞親見，亦同此機軸：

觀《左氏》之書，為傳之最，而時經漢、魏，竟不列於學官，儒者皆折此一家，而盛推二傳。夫以丘明躬為魯史，受經仲尼，語世則並生，論才則同恥。彼二家者，師孔氏之弟子，預達者之門人，才識本殊，年代又隔，安得持彼傳說，比茲親受者乎！加以二傳理有乖僻，言多鄙野，方諸《左氏》，不可同年。故知《膏肓》、《墨守》，乃腐儒之妄述；賣餅、太官，誠智士之明鑒也。（《史通通釋》卷七，〈鑒識〉）

如《穀梁》、《公羊》者，生於異國，長自後來；語地則與魯史相違，論時則與宣尼不接，安得以傳聞之說，而與親見者爭先乎？其短一也。（《史通通釋》卷十四，〈申左〉）

且當秦、漢之世，《左氏》未行，遂使五經雜史，百家諸子，其言河漢，無所遵憑。故其記事也，……其記時也，……古來君子，曾無所疑。及《左傳》既行，而其失自顯，語其弘益，不亦多乎？……於是摯虞、束皙，引其義以相明，王接、荀顛，取其文以相證；杜預申以注釋，干寶籍為《晉紀》。由是世稱實錄，不復言非；其書漸行，物無異議。……夫學者，苟徵此二說，以考三傳，亦足以定是非，明真偽者矣。何必觀汲冢而後信者

<sup>24</sup> 〈蘇轍《春秋集解》以史傳經初探〉，張高評撰，《宋代經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6年10月。

<sup>25</sup> 唯皮錫瑞〈史通申左篇書後〉獨持異議，略謂：子元「學不純經，才惟任史。黨同伐異，不思殫見洽聞，揚《左氏》則置之青雲，抑《二傳》則等之自鄙，軒輊太過，比擬非倫云云，參考同註13，頁296。

乎？以此而言，則三傳之優劣見矣。（《史通通釋》卷十四，〈申左〉）

三傳孰先孰後？今文學家古文學家各執一詞，未有共識。所謂「傳說」、「親受」；「親見」、「傳聞」云者，無非在強調與孔子之關係，衍申而為《春秋》三傳之先後，再演變而為三傳之優劣得失。劉知幾既推揚《左傳》，著書立說乃宗主杜預《集解》之意，強調左氏親見孔子。《嚴氏春秋》引《孔子家語》〈觀周〉篇載：「孔子將修《春秋》，與左邱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邱明為之傳，共為表裏」；其後，《漢書·藝文志》、《漢書·楚元王傳》本之；劉歆亦以為「左邱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於是二傳既得之傳聞，去孔子差遠，遠不如近，聞不如見，此又《左氏》勝《公》《穀》處。<sup>26</sup>《左傳》既以歷史敘事解釋孔子《春秋》經，《春秋》之義，經史百家之惑，有待乎歷史而後可以徵信：於是《左傳》未行，河漢之言「無所遵憑」；《左傳》既行，時事之差忒，「其失自顯」；迨束皙、王接、干寶、杜預諸家徵引發明《左傳》，於是「世稱實錄，不復言非，其書漸行，物無異議」。由此觀之，「定是非，明真偽」，真乃《左傳》之價值，而三傳之優劣，亦由此可見。

春秋之初，五伯代興，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及其末葉，陪臣竊命，禮樂征伐自大夫出，於是朝聘燕饗、征伐盟會，無時無之；行人使臣，冠蓋相望，折衝尊俎，詞命往來，遂成春秋史之重要課題。《左傳》反應世變，外交詞令之表述，尤其精彩可誦，《史通》於此，頗有稱道：

尋《左氏》載諸大夫詞令，行人應答，其文典而美，其語博而奧；<sup>27</sup>述遠古，則委曲如存，<sup>28</sup>徵近代，則循環可覆。<sup>29</sup>必料其功用厚薄，指意深淺，

<sup>26</sup> 《章太炎全集》（二），章炳麟撰，《春秋左傳讀敘錄》皆有申說與駁文，台北：學海出版社，1984年4月，頁858-863。

<sup>27</sup> 《史通·申左》原注：如僖伯諫君觀魚，富辰諫王納狄，王孫勞楚而論九鼎，季札觀樂而談國風，其所援引，皆據禮經之類是也。

<sup>28</sup> 原注：如鄭子聘魯，言少昊以鳥名官；季孫行父稱舜舉八元、八凱；魏絳答晉悼公，引〈虞人之箴〉；子革諷楚靈王，誦〈祈招之詩〉。其事明白，非是厚誣之類是也。

<sup>29</sup> 原注：如呂相絕秦，述兩國世隙；聲子班荆，稱楚材晉用；晉士渥濁諫殺荀林父，說文公敗楚於城濮，有憂色；子服景伯謂吳云，楚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祝佗稱踐土盟晉重耳、魯申、蔡甲午之類是也。

諒非經營草創，出自一時，琢磨潤色，獨成一手。斯蓋當時國史已有成文，丘明但編而次之，配經稱傳而行也。如二傳者，記言載事，失彼菁華，尋源討本，取諸胸臆。夫自我作故，無所準繩；故理甚迂僻，言多鄙野。比諸《左氏》，不可同年。其短三也。（《史通通釋》卷十四，〈申左〉）

《左傳》之外交詞令，可以考察春秋時代之國際情勢。如《史通·申左》原注所舉觀魚、納狄、問鼎、觀樂，以及述遠古，徵近代諸事迹，涉及聘、盟、應對、詞令，以及圍、戰、敗、殺諸事，具有外交史料之意義。就詞令之應對而言，《左傳》所載有「其文典而美，其語博而奧，述遠古則委曲如存，徵近代則迴環可覆」諸多優長；《史通·言語》稱春秋之名卿才士，咸尚考文，大夫行人尤重詞命，「語微婉而多切，言流靡而不淫」。明王鑿著有《春秋詞命》，其〈自序〉稱《左傳》之詞命，「婉而切，簡而莊，巽而直，雖或發於感憤，然猶壯而不激，屈而不撓；詞窮矣，然且文焉，遁而飾，偽而恭，誣而近正」，《左傳》詞命如此美妙，當然由經營草創，琢磨潤色而來。劉知幾推測《左傳》詞命之典麗，謂「當時國史已有成文，丘明但編而次之」；〈言語〉篇亦以為：「非但筆削所致，良由體質素美！」日本學者齋藤謙不然劉說，以為左丘明鋪張文飾太過，當時本語恐不至此。<sup>30</sup>《左傳》詞令之溫潤婉麗，富豔壯闊，突出自國史之手筆，或成於丘明之潤飾，文獻不足，頗難考徵；然較諸二傳之迂僻鄙野，取諸胸臆，誠不可同日而語。筆者以為，左氏載外交詞令，溫潤者傳其溫潤，質樸者傳其質樸，富豔者傳其富豔，浮誇者存其浮誇，亦各徵存其實錄而已，可作春秋外交史料看待。由此觀之，《左傳》載存諸大夫詞令，行人應答，於春秋史而言，不可謂無功。

要之，劉知幾以史家視野，觀察《春秋左氏傳》，遂無往而不史學：以為左丘明「躬為魯史，受經仲尼，語世則並生，論才則同恥」；而且左氏解釋《春秋》經之特色，對於《公羊》《穀梁》二傳頗有「定是非，明真偽」之貢獻。研究《春秋》學，劉氏以為不可「必執二傳之文，為取依經為主」；因為「其外則承告如彼，其內則隱諱如此」，所以「若無左氏立傳，其事無由獲知」。《四庫全書總目》所謂「刪除事跡，何由知其是非？無案而斷，是《春秋》為射覆矣！」《左氏》「以史傳經」

<sup>30</sup> 齋藤謙稱：「人多言春秋時人盡善辭令，予謂不必然。此乃左氏修飾之善爾，較之《公》《穀》，則知之矣！」見《拙堂文話》卷七，日·齋藤謙撰，臺北：文津出版社，1978年，頁7。

之謂也，劉氏此一視點，筆者稱之為「史家之經學觀」。

### 三、敘事藝術與歷史語言之書寫——劉知幾「詩化之史學觀」

《左傳》成公十四年引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孰能脩之？」此即所謂《春秋》五例。前四者示載筆之體，其五示載筆之用。錢鍾書《管錘編》於此頗有發揮，據此言史筆有詩心文心之證，略謂：《春秋》五例，乃史家修史心嚮神往之楷模。雖以之品目《春秋》，然《春秋》實不足語於此：「五例者，實史家之懸鵠，非《春秋》所樹範」，或持以稱述《左傳》之敘事，則周賅允洽，當之無愧。微婉顯晦諸載筆之體，尙簡、崇虛、貴晦、用曲，尤足為史筆富於詩心、文心之證。因舉劉勰《文心雕龍·隱秀》、劉知幾《史通·敘事》、楊萬里《誠齋詩話》等文獻為說，<sup>31</sup>由此觀之，史筆與詩心，或有其共相。劉知幾《史通·申左》討論仲尼修《春秋》，談及《春秋》之義：「尋《春秋》所書，實乖此義；而《左傳》所錄，無愧斯言」，錢氏立說，或宗本於劉氏《史通》，而益加申說。

所謂敘事，即是講故事；敘事作品，即是故事和故事講述者所構成之文學。中國敘事文學大盛於《左傳》，此為學界之共識。<sup>32</sup>章學誠曾云：敘事之法，「離合變化，奇正相生，其法莫備於《左傳》」；陳澧亦謂：「左氏為魯史官，亦不可以直書者，而能曲曲傳之。其敘事之精善，非後世史家所及」。<sup>33</sup>論者稱：歷史敘事之真諦，關鍵祇在如何敘事之藝術方面。<sup>34</sup>劉知幾《史通》有〈敘事〉一篇，

<sup>31</sup> 《管錘編》(一)下卷《左傳正義》，錢鍾書撰，一、〈杜預序〉，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1月，頁311-316。參考《左傳之文韜》，張高評撰，〈左傳之史筆與詩筆〉、〈左傳敘事與言外有意〉，高雄：麗文文化公司，1994年10月，頁165-201；《〈管錘編〉論《左傳》之敘事與記言》，張高評撰，北京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國學研究》第十五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6月，頁358-364。

<sup>32</sup> 《中國敘事學》，浦安迪撰，第一章，三、〈西方與中國的敘事傳統〉，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3月，頁11；《中國早期敘事文論集》，王靖宇撰，二、〈從《左傳》看中國古代敘事作品〉，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9年4月，頁24。

<sup>33</sup> 〈論課蒙學文法〉，章學誠撰，《東塾讀書記》卷十，陳澧撰。

<sup>34</sup> 《史學方法論》，杜維運撰，第十三章〈歷史敘事與歷史解釋〉，臺北：三民書局，1997年9月，頁214。

其中所論尚簡、崇虛、貴晦、用曲諸敘事藝術，錢鍾書《管錐編》以為：「實即五例中『微』、『晦』二例之發揮」。<sup>35</sup>何止二例？「婉而成章」，亦為《左傳》之敘事藝術。從文學語言、詩歌語言之觀點看來，《左傳》既為春秋時代之信史，其歷史語言之書寫，竟標榜尚簡、貴晦之敘事，發揮微婉顯晦之書法，則其中之詩化、文學化是否太過？歷史文學之語言分際當如何？微婉顯晦書法之運用，是否只局限於定哀之際？春秋其他時期書寫政治忌諱、敏感事件是否一體適用？此所宜討論者。

劉知幾十分重視歷史文學，《史通》之〈敘事〉、〈言語〉、〈浮詞〉、〈模擬〉、〈覈才〉、〈點煩〉、〈雜說上〉諸篇，大多討論歷史文學之語言問題。考《史通·自序》，劉知幾「幼喜詩賦，初好文筆，頗獲譽於當時」，長涉藝文，耽悅史傳，「期以述者自命」。雖「恥以文士得名」，然學綜文史，以論史傳語言之書寫，遂有其別識心裁。因此，《史通·載文》固然標榜「不虛美、不隱惡」之實錄，〈惑經〉篇主張「善惡必書」之直筆，〈鑿戒〉篇稱歷史敘事，「當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覈才〉篇更提倡文人不宜修史，強調「文之與史，較然異轍」；凡此表述，皆史書語言之範式，所謂求真之精神也。<sup>36</sup>夫「美言不信」，固然為《老子》所訓誡，然史書苟因此而堅持「信言不美」，亦屬矯枉過正。因此，《史通·六家》稱《春秋》：「微婉其說，志晦其文」；謂史之美者，敘事可「使人味其滋旨，懷其德音，三復忘疲，百遍無斃」；夫子不云乎：「文勝質則史」，故知「史之為務，必藉於文」。由此可見，一方面固然「文之與史，較然異轍」；再方面，又「文之將史，其流一焉」，文史既異轍又合流，相反相成又相濟為用。歷史敘事固然宜重真實客觀之書寫，苟乏文采滋味，則讀者無緣「尋繹不倦，覽諷忘疲」，雖「信言」矣，奈欠缺美妙感動，歷史真實亦無所寄寓存在。過猶不及，權在得中。劉知幾《史通》討論歷史語言之書寫，凸出「詩化之歷史文學觀」，有助釐清文史相異而又相合之問題。其中，自有《春秋》書法與詩歌語言之交融與體現在。

就歷史敘事論，歷史語言之書寫策略，主要表現在藝術形式方面。試考察《史通》〈敘事〉、〈言語〉、〈雜說上〉諸篇，劉知幾論歷史文學，多可見詩歌語言、《春

<sup>35</sup> 同註 31，《管錐編》（一），頁 315。《程千帆全集》，程千帆撰，莫礪鋒編，第六卷《文論十箋》，下輯，〈敘事〉、〈修辭示例〉，「尚簡」、「用晦」，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年 5 月，頁 272-275。

<sup>36</sup> 同上註，「貴真」，頁 275-276。《史學經學與思想》，劉家和撰，〈史學的求真與致用問題〉、〈先秦史學傳統中的致用與求真〉，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 年 1 月，頁 11-37。

秋》書法之含攝與融入。其表現層面大要有三：其一、尚簡；二、用晦；三、存真。史學界於此論述頗多，今詳人之所略，異人之所同，嘗試從詩歌語言、《春秋》書法之觀點，論述《史通》「詩化之史學觀」：

### （一）尚簡

詩文語言之繁簡多寡，歷來爭論不休，或以繁為佳，或以簡為妙。就詩歌特質而言，受限於格律、篇幅、字數、體製之約束，詩歌創作追求精緻而高度濃縮之語言，務求以少勝多，簡要有味。歷代詩話或說鍛煉，或言縮銀，或稱精工，或云句眼，今人或謂之「密度」，<sup>37</sup>多主以最經濟之手法，表現最豐富之意涵。宋王正德《餘師錄》卷二稱：「凡人為文，言約而事該，文省而旨遠者為佳」，此詩歌語言尚簡之說也。

劉知幾既幼喜詩賦，早游文學，而且「初好文筆，頗獲譽於當時」，故論史傳之語言，乃主張敘事簡要，以為「文約而事豐，此述作之尤美者」，其言曰：

夫國史之美者，以敘事為工；而敘事之工者，以簡要為主；簡之時義大矣哉！……然則文約而事豐，此述作之尤美者也。（《史通通釋》卷六，〈敘事〉）

昔夫子有云：文勝質則史，故知史之為務，必藉於文。自五經已降，三史而往，以文敘事，可得言焉。而今之所作者，有異於是。其立言也，或虛加練飾，輕事彫彩；或體兼賦頌，詞類俳優。文非文，史非史；譬夫烏孫造室，雜以漢儀，而刻鵠不成，反類於鶩者也。（《史通通釋》卷六，〈敘事〉）

劉知幾以敘事之簡要，文約而事豐，作為優美史傳之標準，蓋上承《史記·屈賈列傳》稱美屈原作品：所謂「文約辭微，指大意遠」。〈六家〉篇稱《左傳》「其言簡而要，其事詳而博」；說《漢書》：「言皆精煉，事甚該密」；〈書事〉篇，一則感慨「近代史筆，敘事為煩」；同時強調「記事之體，欲簡而且詳，疏而不漏」。倡

<sup>37</sup> 白居易《金針詩格》，魏慶之《詩人玉屑》卷八，〈鍛煉〉；謝榛《四溟詩話》卷三，參閱《中國詩學·設計篇》，黃永武撰，〈談詩的密度——濃縮字面，使字字著實，無一虛設，如同百煉精鋼〉，臺北：巨流圖書公司，1976年6月，頁98-102。

導簡約得實之史筆，主要在反制近古史書之浮華詭誕，《史通·浮詞》可見一斑。劉知幾所以提倡「敘事之工者，以簡要為主」，主要在反對六朝以來文人之修史，史道之陵夷。故論文史關係，一則曰：文之將史，其流一焉；再則曰：文之與史，皎然異轍；三則曰：史之為務，必藉於文；從此可知。故〈論贊〉篇批評「以飾彼輕薄之句，而編為史籍之文，無異加紛黛於壯夫，服綺紈於壯士」；〈序例〉篇亦提明：「爰泊范曄，始革其流。遺棄史才，矜炫文彩」；因此〈敘事〉篇指斥「而今之所作者，有異於是」，抨擊近代以來「其立言也，或虛加練飾，輕事彫彩；或體兼賦頌，詞類俳優。文非文，史非史」；可見敘事尚簡之提出，乃是史筆「妄飾」，敘事凡蕪之反應。除劉知幾外，東晉張輔、唐蕭穎士、張守節、司馬貞諸家，或先或後，亦多有文尚簡要之呼籲。<sup>38</sup>史道陵夷如是，史筆蕪累煩飾如彼，<sup>39</sup>有識之士適時提出「敘事尚簡」之說，亦救世之弊而已。

《史通·敘事》強調史傳文「敘事之工者，以簡要為主」，特提敘事之體有四，以為「四者皆不相須」；又分折敘事之省有二，即省句、省字。其言曰：

蓋敘事之體，其別有四：有直紀其才行者，有唯書其事跡者，有因言語而可知者，有假讚論而自見者。……然則、才行、事跡、言語、讚論，凡此四者，皆不相須，若兼而畢書，則其費尤廣。（《史通通釋》卷六，〈敘事〉）

又敘事之省，其流有二焉：一曰省句。二曰省字。《左傳》宋華耦來盟，稱其先人得罪於宋，魯人以為敏。夫以鈍者稱敏，則明賢達所嗤，此為省句也。《春秋》經曰：「隕石於宋，五。」夫聞之隕，視之石，數之五，加以一字太詳，減其一字太略，求諸折中，簡要合理，此為省字也。（《史通通釋》卷六，〈敘事〉）

考察《史通》一書，所謂敘事者，意同記事。敘事之體，或直紀其才性，或唯書

<sup>38</sup> 詳《晉書·張輔傳》，蕭穎士〈贈韋司業書〉，張守節〈史記集解序注〉，司馬貞〈補史記序〉。

<sup>39</sup> 《史通通釋》卷六〈敘事〉，論六朝以來「史道陵夷」情況云：「自茲已降，史道陵夷，作者蕪音累句，雲蒸泉湧；其為文也，大抵編字不隻，捶句皆雙，脩短取均，奇偶相配；故應以一言蔽者，輒足為二言；應以三句成文者，必分為四句，彌漫重沓，不知所裁。」劉知幾撰，浦起龍，臺北：里仁書局，1980年9月，頁174。

其事跡，或因言語而可知，或假贊論而自見，劉知幾主張：彼此不相須，不相符，不必「兼而畢書」，否則煩蕪失簡，其費尤廣。筆者以為，前二者據事直書，自然約字省詞；至於「因言語而可知」，則藉言記事，節省說明，凸顯個性，推動情節，交待瑣細，相對而言，亦可臻簡要。假贊論而自見者，則是史書補敘之例，前後敘事互見，有發明相得之功。後二者既已避去重出，自然敘事可歸簡要。字句之省約，苟能文簡而理周，亦皆有其可取，〈敘事〉篇舉《左傳》華耦來盟之稱說，唯書「魯人以爲敏」一句，隅反可知「賢達所嗤」；《春秋》經載「隕石於宋五，六鷁退飛過宋都」，語法邏輯符合目治、耳治之觀察理解，措詞語序，不可移易；<sup>40</sup>「加以一字太詳，減其一字太略」云云，所謂簡要也。《春秋》外，唯《左傳》敘事簡要者多，如齊無知弑其君諸兒（莊八），全篇用省筆縮筆；晉太子申生奔新城，《國語·晉語》載其傅杜原款告語 154 字，《左傳》祇以「公殺其傅杜原款」7 字表之（僖四）。《左傳》敘諸工役措施，多出以排偶，精煉簡潔之至；定公六年以後文字，簡峭凝鍊尤有可取。崔述《洙泗考信餘錄》稱：「《左傳》紀事簡潔，措詞亦多體要」；錢大昕〈與友人書〉，謂《左氏》文章之繁，遠勝於《公》《穀》之簡。<sup>41</sup>筆者曾考察《左傳》之敘事語言，或簡而備，或詳而核，紀事簡潔，措詞亦多體要；尤其敘寫戰況處、藉言記事處，工役興作處、弑奪會盟處，以及解經文字處，多作簡筆、整筆、縮筆、省筆，所以「簡以盡神，妙在蘊藉」，《左傳》有之。<sup>42</sup>益信劉知幾《史通·模擬》所謂「《左氏》爲書，敘事之最」。敘事簡要之道，在剝華存實，汰滓存精，劉知幾曾以形象語言作強調，其言曰：

<sup>40</sup> 僖公十六年《春秋·穀梁傳》：「先隕而後石何也？隕而後石也。於宋四境之內，曰宋。後數，散辭也，耳治也。……六鷁退飛，過宋都，先數，聚辭也，目治也。」《春秋·公羊傳》：「曷爲先言實（隕）而後言石？實石記聞，聞其礮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曷爲先言六而後言鷁？六鷁退飛，記見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鷁，徐而察之則退飛。」參閱《語文的闡釋》，申小龍撰，第二章第二節〈古典結構分析與文化微言大義〉，臺北：洪葉文化公司，1994 年 1 月，頁 33-34。

<sup>41</sup> 《潛研堂文集》卷三十三，清錢大昕撰，〈與友人書〉：「文有繁有簡，繁者不可減之使少，猶之簡者不可增之使多。《左氏》之繁，勝于《公》《穀》之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 11 月，頁 607。

<sup>42</sup> 《左傳文章義法擇微》，張高評撰，第四章第二節，一、鎔鍊；第六章第二節，一、繁簡，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2 年 10 月，頁 131-134，頁 211-213。

蓋餌巨魚者，垂其千鈞，而得之在於一筌；捕高鳥者，張其萬置，而獲之由於一目。夫敘事者，或虛益散諱，廣加閑說，必其所要，不過一言一句耳。苟能同夫獵者，漁者，既執而置鈞，必收所留者，唯一筌一目而已；則庶幾胼胝盡去，而塵垢都捐；華逝而實存，滓去而瀦在矣。嗟乎！能損之又損，而玄之又玄，輪扁所不能語斤，伊摯所不能言鼎也。（《史通通釋》卷六，〈敘事〉）

敘事之簡要，在於錘煉整飭關鍵之一言一句，猶釣魚之一筌，捕鳥之一目；若能「損之又損」，如「胼胝盡去，而塵垢都捐」，則玄之又玄，華逝而實存。詩歌語言之鍛煉之道，在文字簡約，而蘊含豐富；字數減少，而意義未減少。濃縮字面，令字字著實，無一虛設，如百煉精鋼者然。此詩化語言之特質，而歷史語言之簡要有相通處。

《舊唐書·劉知幾傳》載：史家須有才、學、識三長，其中史才指史家之文學才華，亦即歷史語言之運用能力，史才之高下影響敘事之工拙，故《史通》提明「國史之美者，以敘事為工」；而「敘事之工者，以簡要為主」，強調史家宜重視省約簡潔，以為「洞識此心，始可言史」。否則，恐如〈浮詞〉篇所謂：「溺於煩富，加字不愜」，發言失中，將「令後之覽者，難以取信」。劉知幾倡「敘事之工者，以簡要為主」，此一詩化之史學觀，與古希臘學者盧奇安（Lucianus，125-192AD）〈論撰史〉強調文筆簡潔之優勝點，有殊途同歸之妙。<sup>43</sup>

## （二）用晦

委婉含蓄，意在言外，是形象表現之一法，更是詩歌語言之主要特徵。隱微、蘊藉、吞吐、用晦，為含蓄之近似詞；直說、正位、徑露、意盡等，則為含蓄之相反相對詞。前者為詩歌語言之特質，後者則否。

釋皎然（?-766-804-?）稱：「兩重意以上，皆文外之旨」；司空圖（837-908）《詩品》標榜「象外之象、韻外之致、味外之旨」，其極至在「不著一字，盡得風流」。<sup>44</sup>歐陽脩（1007-1072）《六一詩話》提出「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

<sup>43</sup> 《史學導論》，姜義華、瞿林東、趙吉惠等撰，第五章第二節，3，〈語言表述的審美要求〉，三、簡潔之美，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年8月，頁258-259。

<sup>44</sup> 《詩式》，唐皎然撰，〈重意詩例〉；《詩品》，司空圖撰，〈含蓄〉，《歷代詩話》本，清何文煥輯，台北：木鐸出版社，1982年2月，頁31、頁40。

姜夔（1155-1221）《白石道人詩說》強調「言有盡而意無窮」，何汶《竹莊詩話》卷一引《漫齋語錄》稱：「詩文皆要含蓄不露，便是好處」，用意十分，或下語三分，或下語六分。<sup>45</sup>楊萬里（1124-1206）《誠齋詩話》更徵引成公十四年《左傳》：「《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以為「此《詩》與《春秋》紀事之妙也」；而且持此以品評李商隱〈龍池〉詩，肯定其「微而顯晦，盡而不汙」之含蓄表述。<sup>46</sup>此法歷代運用既多，遂蔚為《春秋》書法，流變而為史家筆法，與詩歌語言。宋代詩話筆記，有以「微婉顯晦」之《春秋》書法品評詩歌優劣，詩人高下者，足見儒家書法對詩學理論之交融、影響，與體現。<sup>47</sup>

文約而事豐，為劉知幾論史傳敘事簡要所追求之境界；而「省字約文，事溢於句外」之「用晦」，則是敘事簡要之策略，所謂「略小存大，舉重明輕」，「言近而旨遠，辭淺而意深」，與詩歌語言之含蓄蘊藉，《春秋》書法之微婉顯晦自有相通之處，如：

然章句之言，有顯有晦。顯也者，繁詞縟說，理盡於篇中。晦也者，省字約文，事溢於句外。然則晦之將顯，優劣不同，較可知矣。夫能略小存大，舉重明輕，一言而巨細咸該，片語而洪纖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史通通釋》卷六，〈敘事〉）

作者言雖簡略，理皆要害，故能疎而不遺，儉而無闕。譬如用奇兵者，持一當百，能全克敵之功也。（《史通通釋》卷六，〈敘事〉）

蓋文雖缺略，理甚昭著，此丘明之體也。至如敘晉敗於邲，先濟者賞。而云：「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夫不言攀舟亂，以刃斷指，而但曰「舟指可掬」，則讀者自覩其事矣。（《史通通釋》卷八，〈模擬〉）

依〈敘事〉篇所言，「用晦」之道，在「略小存大，舉重明輕」，從紛繁浩瀚之史料事件中，掌握個性化、典型化特徵，進行集中概括與生動勾勒。《左傳》描述晉

<sup>45</sup> 同上註，《歷代詩話》本，《六一詩話》，頁267；《白石道人詩說》，頁681。《竹莊詩話》卷一，何汶撰，〈講論〉，引《漫齋語錄》，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5月，頁1。

<sup>46</sup> 《誠齋詩話》，楊萬里撰，《歷代詩話續編》本，丁福保輯，台北：木鐸出版社，1983年9月，頁139。

<sup>47</sup> 《會通化成與宋代詩學》，張高評撰，〈儒、道、禪與詩歌語言——宋代詩話論含蓄〉，二、（一）儒家書法與微婉顯晦，臺南：成功大學出版組，2000年9月，頁295-300。

楚邲之戰（宣公十二年），左氏但集中概括特寫「舟中之指可掬」畫面，則晉帥無能、將佐跋扈、中軍無備，後有追兵掩至，前有黃河待渡，於是自相殘殺，爭舟亡命之血腥悲慘畫面，歷歷如繪，如在目前。此幅〈亂軍爭渡圖〉，得細節描寫之處理，而形象生動，神韻飛揚。〈模擬〉篇稱其「文雖缺略，理甚昭著」，凡此皆富於含蓄美之「用晦」妙文。宋人詩稱：「誰言一點紅，解寄無邊春」；「春色滿園關不住，一株紅杏出牆來」，差堪比擬此種頰上三毫、「得其意思所在」之藝術構思。<sup>48</sup>語其藝術成效有三：其一，一言而巨細咸該，片語而洪纖靡漏；其二，言近而旨遠，詞淺而意深；其三，睹一事於句中，反三隅於字外，而歸本於「言雖簡略，理皆要害」，所謂「疏而不遺，儉而無闕」，則亦敘事簡要之說也。約言之，凡文章詳簡、曲直、晦明之道，要皆有所涉及。<sup>49</sup>由此觀之，「晦」之意蘊，與《春秋》五例中「微、晦、婉」相通，與《文心雕龍·隱秀》所謂「情在詞外曰隱」之「隱」意亦相近；<sup>50</sup>所不同者，《春秋》之「微」與簡要相當，婉晦重在義理，其中皆有忌諱在；《文心雕龍》隱秀重在情感，《史通·敘事》重在事豐。要之，皆詩性語言之表述也。

劉氏於《史通·敘事》篇所舉史傳「用晦」之例，大多經由形象之描繪，而曲曲表出。通過具體之形象，以演示內在之理趣與情懷，此種「以形見理」之表現方式，為先秦史傳散文及諸子散文表達之常法。<sup>51</sup>顧炎武（1613-1682）說《史記》筆法，有所謂「寓論斷於敘事之中」者，頗可發明劉知幾之「用晦之道」，如下列史傳之形象書寫：

昔古文義，務却浮詞，《虞書》云：「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夏

<sup>48</sup> 詩見蘇軾〈書鄆陵王主簿所畫折枝〉其一，葉紹翁〈游園不值〉，參考《意境·典型·比興編》，徐中玉主編，陳謙豫編選《典型編》，〈集中概括〉，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5月，頁147-161。

<sup>49</sup> 《程千帆全集》第六卷《文論十箋》下輯，〈敘事〉謹案，乙、用晦：「詩之六義，其用有三：直陳曰賦，曲喻曰比曰興。極知文有曲直之異，則可明晦之為用，舍致文于簡括之途外，尤在達意以含蓄之語焉。」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5月，頁274-275。

<sup>50</sup> 〈「隱」「秀」表現中知覺、語言之研究——以宋代詩話為中心〉，岡本不二明撰，馬振方譯，《中國文藝思想史論叢》（二），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年9月，頁206-242。

<sup>51</sup> 《先秦大文學史》，趙明主編，第五編第一節，四、〈以形見理的表達方式〉，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1993年1月，頁920-928。

書》云：「啓呱呱而泣，予不子。」《周書》稱「前徒倒戈，血流漂杵。」《虞書》云：「四罪而天下咸服。」此皆文如閻畧，而語實周贍；故覽之者，初疑其易，而為之，方覺其難。固非雕蟲小技，所能斥非其說也。（《史通通釋》卷六，〈敘事〉）

《虞書》云云，則虞舜德盛，人民感戴，見於言外。《夏書》云云，則夏禹之憂國忘家可知。《周書》云云，則商紂之暴虐、民人之憤慨可見；又《虞書》云云，則凶德、公心皆因文可知。其修辭策略，或出以譬喻，或運用示現，或訴諸誇飾，或安排對襯，先選取適當形象，以象表德，再經修辭表出，於是擬容取心，因象見意。《左傳》臧哀伯論郕鼎（桓二），言文物昭德；王孫滿對楚子問鼎（宣三），稱鑄鼎象物，皆涉形象塑造之範疇。<sup>52</sup>既「擬諸形容，象其物宜」，方能「一言而巨細咸該，片語而洪纖靡漏」。上述「用晦」之例，由於修辭策略運用形象思維，故有「省字約文，事溢於句外」之成效。推此「用晦之道」，以考察「敘事之最」之《左傳》，尤其富有典範意義，如：

既而丘明授經，師範尼父。夫經以數字包義，而傳以一句成言；雖繁約有殊，而隱晦無異。故其綱紀而言邦俗也，則有士會為政，晉國之盜奔秦；邢遷如歸，衛國忘亡。其欵曲而言人事也，則有使婦人飲之酒，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斯皆言近而旨遠，辭淺而義深，雖發語已殫，而含意未盡；使夫讀者望表而知裏，捫毛而辨骨，觀一事於句中，反三隅於字外，晦之時義，不亦大哉？（《史通通釋》卷六，〈敘事〉）

〈敘事〉篇所舉《左傳》「用晦」之例，如士會為政，晉國之盜奔秦（宣十六），則政善可知；如歸忘亡云云，則安集可知；及宋，手足皆見云云，則勇悶可知；寒天楚王巡勉三軍，三軍之士皆如挾纊，則感悅可知。筆者以為，《左傳》善用以果代因之藝術經營手法，凸顯結果成效，刪略過程情態，於是如丹青手作畫，目光著墨多集中在事件之終結或效應上。可見《左傳》用晦之例，頗富有繪畫性效

<sup>52</sup> 《中國古代文學創作論》，張少康撰，第二章〈論藝術形象〉，二、神用象通和擬容取心，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3年12月，頁67-79。

果。由於複雜之事件歷程，業經史家刪汰省略，故文字簡要；史家選取情節形象，只呈現歷史事件之最後效應，讀者解讀時得還原過程，補充原因。由於填補空白，餘韻曲包，故含意不盡，滋味無限。劉知幾稱「用晦」之道，有所謂：「使夫讀者望表而知裏，捫毛而辨骨。覩一事於句中，反三隅於句外」者，誠哉斯言。以果代因，為史筆「用晦」之一法，亦詩歌語言之常法，<sup>53</sup>樂府詩〈陌上桑〉，《西廂記》第一本第四折，圖寫羅敷與崔鶯鶯之美麗，即用此法。

至於《史記》、《漢書》「用晦」之例，劉知幾亦枚舉四例，要皆為形象思維，非邏輯思辨，如：

洎班、馬二史，雖多謝五經，必求其所長，亦時值斯語；至若高祖亡，蕭何如失左右手。漢兵敗績，睢水為之不流。董生乘馬，三年不知牝牡。翟公之門，可張雀羅。則其例也。（《史通通釋》卷六，〈敘事〉）

《史記·淮陰侯列傳》載：蕭何亡追韓信，高祖如失左右手，以譬況手法，比擬形容，則蕭何輔弼之功，高祖倚任之重，多見於言語之外。《史記·項羽本紀》載：睢水之役，漢兵敗績，睢水為之不流，以「水為之不流」之形象效應，凸顯漢卒敗亡之慘重，以結局勾勒替代情節過程之描述，以果代因，形象之重現可謂歷歷如繪。《漢書》稱董仲舒勤學，「十年不窺園圃，乘馬三年，不知牝牡」，<sup>54</sup>蓋勤學專業，顧此則失彼，《漢書》以側筆見態，令人想見其餘，是亦用晦之一道。《史記·汲鄭列傳》、《漢書·汲鄭列傳》〈贊〉，皆載翟公廢退情狀，以「門外可張羅雀」之形象效應，見世態之炎涼，人情之冷暖。門可羅雀，為「門前冷落車馬稀」廢退情狀之特寫，以果代因，立象見意，讀者不難彷彿其餘。劉知幾所謂「望表而知裏，捫毛而辨骨」之用晦，用意十分，下筆三分而已，故多「不著一字，盡得風流」之言外旨意，此與詩歌語言之含蓄蘊藉，《春秋》書法之微婉顯晦，有異曲同工之妙。

對於歷史語言之審美要求，論者標舉七項，其中含蓄之美，即《史通》「用晦」之意，且據以比附《日知錄》所稱「古人作史，有不待論斷而於序事之中，即見

<sup>53</sup> 《宋詩之新變與代雄》，張高評撰，附錄三、〈談詩歌語言與言外之意〉，一、以果代因，臺北：洪葉文化公司，1995年9月，頁526-527。

<sup>54</sup> 《太平御覽》刑法志引《漢書》，文字如此，與今本《史記·儒林傳》，《漢書·董仲舒傳》有出入。

其指者」，此史家「於序事中寓論斷法也」。<sup>55</sup>白壽彝曾撰〈司馬遷寓論斷于序事〉一文，列「細節描寫」為其中表達形式之一，專家學者更持以作《史記》寫人藝術之重要策略。<sup>56</sup>其優長在形象生動鮮明，寓意深刻廣博，典型集中概括，往往具有形神兼備之藝術魅力。此《春秋》書法之「晦婉」，與《史通》之「用晦」，多經由細節描寫之形象語表出，要皆富於含蓄蘊藉之美者。

### （三）存真

真實不妄，為文學藝術創作之追求標竿。就文藝而言，創作的來源與情感，需要真實；作品之魅力，更有賴想像之真實、情理之真實、審美之真實等藝術真實。<sup>57</sup>《論語·八佾》稱「盡善盡美」，《禮記·表記》謂：「情欲信，辭欲巧」，先秦儒家文藝美學即要求：真實無偽之情感內容與精巧華美之文辭表達，必須和諧統一；易言之，真與美宜相濟為用。

歷朝文人論詩，亦多標榜「真」字，蓋唯有真性真情，方有真詩；唯有情真、志真、景真、境真、事真、理真、意真、趣真，詩作方能掩有古今。藝術真實，正是作品中情、志、景、境、事、理、意、趣諸方面「真實」與美感表現之合成。<sup>58</sup>歷史不可能全真，而貴在接近真實；若歷史流於虛幻荒誕，將失去意義與價值。章學誠揭櫫「史德」「文德」之大纛，梁啟超拈出「鑑空衡平」之期許；<sup>59</sup>錢鍾書

<sup>55</sup> 同註 43，一、真實之美；二、質樸之美；三、簡潔之美；四、動態之美；五、含蓄之美；六、力量之美；七、形象之美。頁 257-262。

<sup>56</sup> 《中國史學史論集》，白壽彝撰，〈司馬遷寓論斷于敘事〉，「細節的描寫」，北京：中華書局，1999 年 4 月，頁 93-97；《史記文學成就論說》，可永雪撰，第四章第四節〈史記的細節的描寫〉，呼和浩特：內蒙古教育出版社，2003 年 9 月，頁 144-158。

<sup>57</sup> 《中國古典文藝學叢編》(二)，胡經之主編，八、〈真幻〉，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 年 7 月，頁 228。

<sup>58</sup> 如北宋邵雍〈詩史吟〉云：「詩史善記事，長於造其真」；南宋劉辰翁論晉人為詩掩出古今，「無他，真故也」；元陳繹曾《詩譜》評〈古詩十九首〉之美，在「情真、景真、事真、意真」；明陸時雍《詩境總論》拈出「詩貴真」，強調「詩之真趣」；清尤侗宣稱：「詩無古今，惟其真爾」；孫聯奎《詩品臆說》亦云：「惟有真性，故有真情，有真情，故有真詩」，同上註，頁 237-261。參考《中國美學範疇辭典》，成復旺主編，〈美論·真〉，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5 年 6 月，頁 194-196。

<sup>59</sup> 章學誠《文史通義》內篇二，〈文德〉；內篇五，〈史德〉；《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梁啟超撰，總論第二章〈史家的四長〉，甲、史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 12 月，

研究《左傳》，發現「史家追敘真人真事，每須遙體人情，懸想事勢，設身局中，潛心腔內，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幾入情入理」，此乃歷史想像與歷史真實間之辯證，<sup>60</sup>關係詩歌與歷史之相通相融，以及真幻虛實之分合消長諸課題，今論述如下，以見劉知幾「詩化史學觀」之一斑：

史書以體現客觀真實為職志，故史學貴在求真。劉知幾《史通》重視史料之徵實，追求史傳書寫之真實不妄，故提出「直筆」與「實錄」，反對「曲筆」與「偽史」。《史通·曲筆》稱：「良史以實錄直書為貴」，故論者以「實錄史學」概括劉知幾史學之特色，可謂知道。<sup>61</sup>簡言之，所謂實錄，就史料編纂言，為據事直書；就寫作策略而言，為書法不隱。實錄，善惡必書，如實呈現，如明鏡照人，虛空傳響；直筆，則不隱惡，不虛美，舉宏存大，有益褒貶。《史通》〈惑經〉、〈直書〉、〈曲筆〉、〈雜說下〉諸篇言之詳矣，不贅。自《左傳》載孔子稱董狐：「書法不隱」；《漢書·司馬遷傳》論《史記》：「不虛美，不隱惡」，《文心雕龍·史傳》所謂「彰善癉惡，樹之風聲」；至《史通》提出「實錄」「直書」，可謂能踵事增華，而下開章學誠「史德」「文德」之說者矣。<sup>62</sup>

劉知幾稱頌直書，鄙夷批判曲筆，自有初唐歷史與政治之背景在。唐初高祖李淵提示修史原則，唐太宗李世民關切玄武門之變，先後榻檮「書法無隱」、「直書其事」之治史原則，於是歷朝史官直書善惡，無取人情，講究信史，標榜實錄，<sup>63</sup>劉知幾《史通》論直書，說實錄，自是唐初史學之優良傳統。劉知幾《史通》稱「善惡必書，斯為實錄」，而批評孔子修《春秋》之曲筆，頗以形象語言為比況。蓋《春秋》經「為尊者諱恥，為賢者諱過」之諱言諱書；<sup>64</sup>《春秋》所記，皆承赴告，多非其實，於是敘事傳人或乖違實錄之原則，其言曰：

頁 156-158。

<sup>60</sup> 同註 31，《管錐編》，頁 317-318；參考同註 34，第十二章〈歷史想像與歷史真理〉，頁 191-205。

<sup>61</sup> 《劉知幾的實錄史學》，許冠三撰，香港：香港中文大學，1983 年。

<sup>62</sup> 《史傳通說》，汪榮祖撰，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8 年 10 月；《史通的歷史敘述理論》，彭雅玲撰，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3 年 6 月；《章實齋以史統文的文論研究》，王義良撰，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1995 年 1 月。

<sup>63</sup> 《唐代史學論稿》，瞿林東撰，〈唐代史學中的直書與曲筆〉，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 年 3 月，頁 61-70。

<sup>64</sup> 《春秋穀梁經傳補注·成公九年》，清鍾文烝撰：「為尊者諱恥，為賢者諱過，為親者諱疾。」北京：中華書局，1996 年 7 月，頁 495。

蓋明鏡之照物也，妍媸必露；不以毛嫱之面或有疵瑕，而寢其鑒也；虛空之傳響也，清濁必聞，不以綿駒之歌時有誤曲，而輟其應也。夫史官執簡，宜類於斯；苟愛而知其醜，憎而知其善，善惡必書，斯為實錄。觀夫子修《春秋》也，多為賢者諱，狄實滅衛，因桓恥而不書；河陽召王，成文美而稱狩。斯則情兼向背，志懷彼我。苟書法其如是也，豈不使人君者，靡憚憲章，雖玷白圭，無慙良史也乎？（《史通通釋》卷十四，〈惑經〉）蓋君子以博聞多識為工，良史以實錄直書為貴；而《春秋》記它國之事，必憑來者之辭，而來者所言，多非其實。或兵敗而不以敗告，君弑而不以弑稱；或宜以名而不以名，或應以氏而不以氏；或春崩而以夏聞，或秋葬而以冬赴；皆承其所說而書，遂使真偽莫分，是非相亂。（《史通通釋》卷十四，〈惑經〉）

良史以實錄直書為貴，當如明鏡照人，虛空傳響，真實呈現，無所遁隱；所謂「愛而知其醜，憎而知其善，善惡必書，斯為實錄」。否則，謹嚴如《春秋》，所記多承諸侯赴告，<sup>65</sup>然赴告往往「多非其實」，故所承記亦難免有「真偽莫分，是非相亂」之缺失。劉知幾極推重《左傳》之敘事，以為乃「敘事之最」，〈六家〉篇更稱美《左傳》，以為「其言簡而要，其事詳而博，信聖人之羽翮，而述者之冠冕」。《左傳》敘事之尚簡用晦，已說如前，其通俗語言「體質素美」，固質樸可信，其外交詞令「微婉多切，流靡不淫」，亦髣髴「當時發言」實況，大抵多為春秋時代言語溫潤之寫真，如：

《左氏》述臧哀伯諫桓納鼎，周內史美其讜言；王子朝告于諸侯，閔馬父嘉其辨說；凡如此類，其數實多，斯蓋當時發言，形於翰墨，立言不朽，播於他邦。而丘明仍其本語，就加編次。亦猶近代《史記》載樂毅、李斯之文，《漢書》錄晁錯、賈生之筆。尋其實也，豈是子長筆削，孟堅雌黃，所構者哉？（《史通通釋》卷十四，〈申左〉）

尋《左氏》載諸大夫詞令，行人應答，其文典而美，其語博而奧；述遠古，

<sup>65</sup> 《春秋左氏傳杜注釋例》，葉政欣撰，〈外事赴告乃書例〉、〈從告而書例〉、〈告辭略例〉，台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研究論文第六十一種，1966年5月，頁29-30、頁37-38、頁41。

則委曲如存，徵近代，則循環可覆。必料其功用厚薄，指意深淺，諒非經營草創，出自一時，琢磨潤色，獨成一手。斯蓋當時國史已有成文，丘明但編而次之，配經稱傳而行也。（《史通通釋》卷十四，〈申左〉）

《左傳》所載春秋詞命，劉知幾稱賞「其文典而美，其語博而奧。述遠古，則委曲如存，徵近代，則循環可覆」，這些大夫之詞令，行人之應答，劉知幾以為大抵是當時言語之寫真與實錄，故一則曰：「斯蓋當時發言，形於翰墨，立言不朽，播於他邦。而丘明仍其本語，就加編次」；再則曰：「斯蓋當時國史已有成文，丘明但編而次之，配經稱傳而已」，就歷史編纂學而言，此之謂徵實；丘明「仍其本語，就加編次」；「編而次之，配經稱傳」，《左傳》以史傳經，而實錄在其中。蓋唯有情真、語真，方有理真、境真可言。外交詞令、行人專對之可信據，以此。試較之〈載文〉篇所謂「喻過其體，詞沒其義，繁華而失實，流宕而忘返」之《史》《漢》若干列傳，《左傳》敘事載言據事直書，實錄言語，往往能「撥浮華，採貞實」，差可謂之實錄。故《史通·言語》篇曰：

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大夫行人，尤重詞命。語微婉而多切，言流靡而不淫，若《春秋》（案：實指《左傳》）載呂相絕秦、子產獻捷、臧孫諫君納鼎、魏絳對戮揚干是也。（《史通通釋》卷六，〈言語〉）

《左傳》所載春秋時期大夫行人之詞命與談說，如上列〈絕秦〉（成十三）、〈獻捷〉（襄二十五）、〈納鼎〉（桓二）、〈對戮〉（襄三），語言多微婉流靡，典雅美妙，所謂「事皆不謬，言必近真」也。較之後代史乘，「枉飾虛言，都捐實事」，真不可同日而語。詞命之典雅，固然由「丘明仍其本語，就加編次」而成實錄，即通俗語言如童豎之謠、時俗之諺、輿人之誦，亦因《左傳》載言兼錄雅俗，而得徵存，遂存春秋口語之實錄，如：

尋夫戰國已前，其言皆可諷詠，非但筆削所致，良由體質素美。何以覈諸？至如「鶉賁」、「鸚鵡」，童豎之謠也；「山木」、「輔車」，時俗之諺也；「蟠腹棄甲」，城者之謳也；「原田是謀」，輿人之誦也。斯皆芻詞鄙句，猶能溫潤若此，況乎束帶立朝之士，加以多聞博古之識者哉！則知時人出言，史官入記，雖有討論潤色，終不失其梗概者也。（《史通通釋》）

## 卷六，〈言語〉)

劉知幾對歷史語言之書寫，與《史通》批判諸史，「多譏往哲，喜述前非」一致，獨於《左傳》語言運用之匠心獨到，極力稱揚：如《左傳》所載童豎之謠、時俗之諺、輿人之誦諸「芻詞鄙句」，猶能溫潤如此，言皆可諷詠；以為「非但筆削所致，良由體質素美」，「時人出言，史官入記，雖有討論潤色，終不失其梗概」。由此觀之，《左傳》載言，多「設身局中，潛心腔內」，以之擬言代言，由於情真、事真、理真、境真，故文章富於真實感，能引人入勝。

劉知幾稱：「《左氏》為書，敘事之最」，《左傳》以歷史敘事傳寫春秋史事，「其言簡而要，其事詳而博」，於敘事傳人尤稱卓絕，《史通·二體》於此曾有概述，如：

夫《春秋》者，繫日月而為次，列世歲以相續，中國、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備載其事，形于目前。理盡一言，語無重出，此其所以為長也。至於賢士貞女，高才雋德，事當衝要者，必盱衡而備言；跡在沉冥者，不枉道而詳說。如絳縣之老，杞梁之妻，或以酬晉卿而獲記，或以對齊君而見錄。其有賢如柳惠、仁若顏回，終不得彰其名氏，顯其言行。故論其細也，則纖介無遺；語其粗也，則丘山是棄，此其所以為短也。（《史通通釋》卷一，〈二體〉）

上文所謂《春秋》，實指《左傳》。劉知幾稱《左傳》編年敘事，其優長為「中國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備載其事，形於目前，理盡一言，語無重出」；且「事當衝要者，必盱衡而備言」；然「跡在沉冥者，不枉道而詳說」，詳略粗細，無從兼顧，此其所短。《左傳》敘事，或纖介無遺，或丘山是棄，牽涉歷史編纂時，筆削取捨之標準，史識史觀之權衡，史家自有其原則與圭臬，不能一概而論，與直書實錄亦無關聯。其中，「備載其事，形于目前」，堪稱敘事存真；「理盡一言，語無重出」，則敘事簡要。大抵說來，劉知幾對《左傳》之敘事多贊譽有加，《史通·雜說上》尤其如此：

《左氏》之敘事也，述行師，則薄領盈視，叱咤沸騰；論備火，則區分在目，修飾峻整；言勝捷，則收獲都盡；記奔敗，則披靡橫前；申盟誓，則

慷慨有餘；稱譎詐，則欺誣可見；談恩惠，則煦如春日；紀嚴切，則凜若秋霜；敘興邦，則滋味無量；陳亡國，則淒涼可憫。或腴辭潤簡牘，或美句入詠歌，跌宕而不群，縱橫而自得。若斯才者，殆將工侷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聞，古今卓絕。如二傳之敘事也，榛蕪溢句，疣贅滿行，華多而實少，言拙而寡味，若必方於《左氏》也，非惟不可為魯衛之政，差肩雁行，亦有雲泥路阻，君臣禮隔者矣。（《史通通釋》卷十六，〈雜說上〉）

劉知幾論《左傳》敘事之精妙者，枚舉其行師、勝捷、奔敗、盟誓等有關戰爭文學繪聲繪影之具象效果，譎詐、恩惠、嚴切諸性情襟抱，心理描繪；以及備火、興邦、亡國等有關領導統御、家國興亡之細節描寫，上述十大事類，多以形象語言，作有聲有色之呈現，《左傳》固然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千載下讀之，猶能體味出「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之韻致。〈雜說上〉稱美《左傳》之敘事，「或腴辭潤簡牘，或美句入詠歌，跌宕而不群，縱橫而自得。若斯才者，殆將工侷造化，化思涉鬼神，著述罕聞，古今卓絕」，推崇《左傳》之敘事成就，堪稱空前絕後，世罕其匹。

《左傳》敘事中之歷史語言書寫，錢鍾書以為多「擬言代言」之詞，屬歷史想像，藝術真實之範疇。筆者曾撰文詮釋之，<sup>66</sup>其中如介之推與母偕逃前之問答（僖二十四）、刺客鉏臯自殺前之慨歎（宣二），大抵「皆生無傍證，死無對證者」，錢氏以為如此書寫，乃「左氏設身處地，依傍性格身分，假之喉舌，想當然耳」之歷史想像。此外，《左傳》敘晉楚城濮之戰（僖二十八），子玉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目空一切，已兆敗徵；迨晉文公聞子玉自殺，曰：「莫余毒也已！」寫大患消除，喜出望外。文貴察聲，喜怒皆肖其聲，此之謂也。又如《左傳》敘晉楚鄢陵之戰（成十六），巢車之望，透過君臣對話，而敵方軍隊調動之虛實狀況，經由敘事眼睛，如實表述、和盤托出。錢氏稱賞此一「藉言記事」之言敘法，以為「不直書甲之運為，而假乙眼中舌端出之，純乎小說筆法矣！」如此言敘，既鋪陳場面，推進情節，又可凸顯人物個性，省略枝節交待，語真、景真、事真、境真，令讀者有實臨現場之感受。《左傳》言敘語敘若此者，尚多有之，今為篇幅所限，從略。

<sup>66</sup> 同註 31，張高評〈《管錐編》論《左傳》之敘事與記言〉，三、《左傳》、記言，乃擬言代言，頁 364-373。

#### 四、結語

史才、史學、史識，乃史家之三長，為劉知幾所提倡，載於《舊唐書》《新唐書》本傳。筆者以為，此即《孟子·離婁下》述《春秋》，所謂其文、其事、其義之說；吳縝所謂為史三要：文采、事實、褒貶也。<sup>67</sup>劉知幾「三為史臣，再入東觀」，曾針對史館弊端，提出「五不可」之缺失；以為「古之國史，皆出自一家」，故私撰《史通》，標榜實錄直書，強調獨斷之學。劉知幾治史，頗具獨到之史識，依據史家視角，對史書作類聚群分，故有六家二體之目；表明經史同源，故論《春秋》《左傳》，多徵之事實；論二傳得失，亦準此為權衡，所謂史學淹通，有良田黃金，能貨殖生財矣。《史通·自序》：「余初好文筆，頗獲譽於當時」，《史通》揭櫫歷史語言敘事之藝術，如尚簡、用晦、存真之倫，非有「思兼匠石，巧若公輸」之史才，何能現身說法如此？

本論文討論劉知幾之《左傳》學，兼論其詩化之史學觀，大抵依史才、史學、史識三大方面作考察，獲得下列結論：

- (一) 唐初太宗高宗朝刊定《五經正義》，頒行天下，企圖經學一統；劉知幾私撰《史通》，多譏往哲，喜述前非，不僅破棄墨守，挑戰典範，對於啖助新《春秋》學派及宋學崇尚懷疑、創造、開拓、議論諸精神，頗有開啓作用。
- (二) 源流正變、因革損益，是考評一切學術之準則。劉知幾《史通》論點雖多受《論衡》、《文心雕龍》、《隋書·經籍志》之啓發；尚簡、用晦、實錄、直書諸法，可能為唐初史學優良傳統之發揚，然《史通》踵事增華，集腋為裘，善繼集成，其功足多。
- (三) 就史學而言，《左傳》以歷史敘事解釋孔子《春秋》經：「言見經文而事詳傳內」；《左傳》以史傳經，是讓歷史自己講話，還原歷史本來面目，故劉知幾以為「傳之與經，其猶一體，廢一不可，相須而成」。學者苟欲觀「善惡必彰，真偽盡露」之實錄，求之《左傳》敘

<sup>67</sup> 宋吳縝《新唐書糾謬》稱：「為史之要有三：一曰事實，二曰褒貶，三曰文采。有是事而如是書，斯謂事實；因事實而寓懲勸，斯謂褒貶；事實、褒貶既得矣，必資文采以行之，夫然後成史」，與劉知幾所提學、識、才可以相發明，亦不離《孟子》其事、其文、其義之說。台北：世界書局，1986年。

事，當無愧斯言；若考尋《春秋》所書，則「實乖此義」。

- (四) 《左傳》以史傳經，其言簡而要，其事詳而博，其「敘事之最」之史學成就，不僅為「三傳之雄霸」，「信聖人之羽翮，而述者之冠冕」；劉氏且據以權衡《春秋》與二傳之是非得失：於是〈惑經〉稱《春秋》有十二未論、五虛美；〈申左〉篇稱「《左氏》之義有三長，而《二傳》之義有五短」，其所論說，大抵以《左傳》之敘事為考察較量之準的，此劉氏「史家之經學觀」也。
- (五) 史才，指天賦之文學才華，非後天可以學得。劉氏極重視歷史文學，尤其是史傳語言書寫之策略。或許因早游文學、幼喜詩賦之影響，劉知幾《史通》檮糞「尚簡」、「用晦」諸歷史語言，要皆詩歌語言之圭臬；而存真、實錄，則又介乎詩史之際，涉及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諸課題，故筆者以「詩化之史學觀」，指稱劉氏對歷史文學之論述。
- (六) 劉氏稱：「文之將史，其流一焉」，故「史之為務，必藉於文」；然六朝以來史書浮華詭誕，「文非文，史非史」，劉氏乃宣言「文之與史，皎然異轍」。是振救史學之流弊，故《史通》稱美敘事之簡要，以為國史之美；而《左氏》為書，號稱敘事之最，故劉氏所述「敘事之體四」，「敘事之省二」，以及華逝實存，文約事豐，《左傳》敘事多有具體而微之體現。
- (七) 省字約文，避免煩蕪浮華，為敘事簡要之方，而「用晦」則是達成敘事簡要之重要策略。用晦之道，「略小存大，舉重明輕」，言史料之取捨別裁；「一言而巨細咸該，片語而洪纖靡漏」，涉及語言之經營安排。「文雖缺略，理甚昭著」；「言近而旨遠，辭淺而義深」，為用晦之美學特徵；「雖發語已殫，而含意未盡；使夫讀者望表而知裏，捫毛而辨骨，覩一事於句中，反三隅於字外」，則為其美感效應，蓋合形象美、含蓄美、簡潔美而一者。
- (八) 劉氏主張實錄直書，期許歷史敘事如明鏡照人，虛空傳響，真實呈現。語言書寫，為敘事之一環，頗得劉氏之重視。尤其推崇《左傳》「言事相兼，煩省合理」，足以令讀者尋繹不倦，覽諷忘疲。且以為《左傳》之通俗語言，溫潤素美，非經琢磨筆削；其外交詞命，行人應答，微婉而多切，流靡而不淫，是樸拙典雅，多傳其真。至於

敘事之精妙，貴在寫真；擬言代言，涉及藝術真實與歷史想像之辯證，其要多歸於史學存真之課題。

## 引用文獻

### 一、古籍原典（依成書時間為序）

- 《史通通釋》，唐·劉知幾撰，浦起龍釋，臺北：里仁書局，1980年9月。
- 《詩式》，唐·皎然撰，《歷代詩話》本，清·何文煥輯，台北：木鐸出版社，1982年2月。
- 《詩品》，唐·司空圖撰，《歷代詩話》本，清·何文煥輯，台北：木鐸出版社，1982年2月。
- 《太平御覽》，宋·李昉編，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2月。
- 《六一詩話》，宋·歐陽脩，《歷代詩話》本，清·何文煥輯，台北：木鐸出版社，1982年2月。
- 《白石道人詩說》，宋·姜夔撰，《歷代詩話》本，清·何文煥輯，台北：木鐸出版社，1982年2月。
- 《誠齋詩話》，宋·楊萬里撰，《歷代詩話續編》本，丁福保輯，台北：木鐸出版社，1983年9月。
- 《竹莊詩話》，宋·何汝撰，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5月。
- 《舊唐書》，宋·劉昫編，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 《新唐書》，宋·歐陽脩、宋祁編，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
- 《新唐書糾謬》，宋·吳縝撰，台北：世界書局，1986年。
- 《唐會要》，宋·王溥編，台北：世界書局，1961年。
- 《日知錄》，清·顧炎武撰，清·黃汝成《集釋》本，樂保群、呂宗力校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2月。
- 《四庫全書總目》，清·紀昀等編，臺北：藝文印書館，1974年10月。
- 《經義考》第五冊，清·朱彝尊編著，林慶彰等點校補正本，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7年12月。
- 《春秋穀梁經傳補注》，清·鍾文烝撰，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7月。
- 《經學歷史》，清·皮錫瑞撰，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7月。
- 《潛研堂文集》，清·錢大昕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11月。
- 《章太炎全集》，章炳麟撰，台北：學海出版社，1984年4月。

### 二、近人專著（依出版時間為序）

- 《春秋左氏傳杜注釋例》，葉政欣撰，台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研究論文第

六十一種，1966年5月。

- 《中國詩學·設計篇》，黃永武撰，臺北：巨流圖書公司，1976年6月。
- 《拙堂文話》，日·齋藤謙撰，臺北：文津出版社，1978年。
- 《兩漢思想史》，徐復觀撰，臺北：學生書局，1979年9月。
- 《與西方史家論中國史學》，杜維運撰，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1年8月。
- 《左傳文章義法擲微》，張高評撰，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2年10月。
- 《劉知幾的實錄史學》，許冠三撰，香港：香港中文大學，1983年。
- 《中國古代文學創作論》，張少康撰，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3年12月。
- 《中國史學家評傳》，陳清泉等編，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3月。
- 〈「隱」「秀」表現中知覺、語言之研究——以宋代詩話為中心〉，岡本不二明撰，馬振方譯，《中國文藝思想史論叢》(二)，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年9月。
- 《左傳導讀》，張高評撰，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年8月。
- 《史傳通說》，汪榮祖撰，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8年10月。
- 《唐代史學論稿》，瞿林東撰，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年3月。
- 《北宋文化史述論》，陳植鏗撰，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3月。
- 《春秋左傳學史稿》，沈玉成、劉寧撰，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6月。
- 《先秦大文學史》，趙明主編，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1993年1月。
- 《史通的歷史敘述理論》，彭雅玲撰，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3年6月。
- 《語文的闡釋》，申小龍撰，臺北：洪葉文化公司，1994年1月。
- 《意境·典型·比興編》，徐中玉主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5月。
- 《左傳之文韜》，張高評撰，高雄：麗文文化公司，1994年10月。
- 《章實齋以史統文的文論研究》，王義良撰，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1995年1月。
- 《中國美學範疇辭典》，成復旺主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5年6月。
- 《宋詩之新變與代雄》，張高評撰，臺北：洪葉文化公司，1995年9月。
- 《中國敘事學》，浦安迪撰，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3月。
- 《程千帆選集》(上)，莫礪鋒編，瀋陽：遼寧古籍出版社，1996年6月。
- 《中國史學思想史》，吳懷祺撰，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12月。
- 《史學方法論》，杜維運撰，臺北：三民書局，1997年9月。

- 《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梁啓超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12月。
- 《中國早期敘事文論集》，王靖宇撰，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9年4月。
- 《中國史學史論集》，白壽彝撰，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4月。
- 《會通化成與宋代詩學》，張高評撰，臺南：成功大學出版組，2000年9月。
- 《管錐編》，錢鍾書撰，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1月。
- 《程千帆全集》，程千帆撰，莫礪鋒編，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5月。
- 《禪宗思想淵源》，吳言生撰，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6月。
- 《中國古典文藝學叢編》，胡經之主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7月。
- 《春秋書法與左傳學史》，張高評撰，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2年1月。
- 《啖助新春秋學派研究論集》，張穩蘋編，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2年9月。
- 《史學導論》，姜義華、瞿林東、趙吉惠等撰，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年8月。
- 《史記文學成就論說》，可永雪撰，呼和浩特：內蒙古教育出版社，2003年9月。
- 《中國經學思想史》第二卷，姜廣輝主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9月。
- 《史學經學與思想》，劉家和撰，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1月。
- 〈蘇轍《春秋集解》以史傳經初探〉，張高評撰，《宋代經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6年10月。

### 三、期刊論文（依發表時間為序）

- 〈試論劉知幾與章學誠對《春秋》理解的異同〉，李紀祥撰，《簡牘學報》第十五期，1993年12月。
- 〈台灣地區《史通》研究之回顧（1949-1994）〉，李紀祥撰，《國立編譯館館刊》25卷1期，1996年6月。
- 〈《史通》研究五十年（1949-1998）〉，戴繼華撰，《中國史研究動態》2000年1期。
- 〈《史通》敘事尚簡論初探〉，洪之淵撰，《溫州師範學院學報》22卷2期，2001年4月。
- 〈義例、名教與實錄——劉知幾史學思想溯義〉，閻鴻中撰，《臺大歷史學報》第31期，2003年6月。

〈《管錐編》論《左傳》之敘事與記言——錢鍾書之《左傳》學〉，張高評撰，北京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國學研究》第十五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6月。

## Liu ZhiJi's *ChunQiu* and *ZuoZhuan* Studies: And discuss the views of the historiography of the Poeticization

Chang, Kao- ping \*

[Abstract]

Early Tang Dynasty Liu ZhiJi (劉知幾) Privately published *Shi Tong* (史通), almost ridiculed the former philosopher and criticized their right and wrong. Liu not only discarded the norms but also challenge the model. This article accords to views of the classics of historians and the views of the historiography of the poeticization to evaluate Liu's *ZuoZhuan* (左傳) study. We gets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 first, *Zuo Zhuan* explained the classics with the history. If scholars want to know the record of " Good and evil show up, real and hypocrisy display fully. ", should seek *Zuo Zhuan*. *Chun Qiu* (春秋) is not justice. Second, *Zuo Zhuan* is the best narratives. Indeed enhance and glorify the theory of saints, the most important writings of *three Zhuan* (三傳). Liu often Commented *Chun Qiu* and *GongYang Chuan* (公羊傳), *GuLiang Chuan* (穀梁傳) by *Zuo Zhuan*. *Zuo Zhuan* has three advantages, *GongYang Chuan* and *Gu Liang Chuan* have five disadvantages. Third, Liu paid attention to the literature of the history very much. He advocated various historical language of "advocating simple and clear "and" implicitness ". Those are standards of the poetry language. To show real and the record are between the poetry and the history. Fourth, to save the historic defects, *Shi Tong* declared the narrative summary, that is, although the flowers disappeared, fruit stayed. The text was simple but its meaning was rich. *Zuo Zhuan*'s narratives liked that. Fifth, advocating the way of using implicitness, probably involved in the selection of other historical materials. Management arrangements of the language could show the poetical characteristics, strengthen the aesthetic effect. That combined the beauty of

---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image, implicit and brief. Sixth, Liu was affected by the historiography of the Early Tang Dynasty, claiming straight record, expecting historical narratives to show real. He respected *Zuo Zhuan* " To record dialogue with the events described in balance. No matter the length of articles devoted all right ." Everyone recited the vulgar. That's moderate and moving, not specially modified. Foreign words were fluent and elegant, only made a show. As for narrative biographies and alternative historians's words, just attributed to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true history.

**Keywords:** *Shi Tong* 史通, *Zuo Zhuan* 左傳, to explain classics with the history, advocating simple and clear, implicitness, to show real

